

清华校歌与词作者汪鸾翔

○汪端伟

一、清华大学校歌沿革

1913年秋，清华学校音乐教师 Miss Kathorine E. Seelye 为清华学校写了英文校歌 *College Song* 词曲。歌词首次刊登在 1914 年 8 月出版的英文年刊 *Tsinghua Annual* 上。

这首英文校歌的中译本全文刊登在《清华周刊》第三次临时增刊（1917 年 6 月 16 日）的“校闻”栏目中。

1924 年 3 月，中文清华校歌诞生了，《清华周刊》307 期上刊登了歌谱，标题为《清华学校校歌·汪鸾翔先生撰歌·何林一夫人作曲》。关于这个中文校歌的解说，最权威的当推词作者汪鸾翔先生在 1925 年写的《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以下简称《真义》）一文。

清华中文校歌诞生的过程，在《真义》中有这样的叙述：

本校中文校歌选择于前两年征求校歌之时，在作者对于世界学术思想之变迁，以及我校教育方针之择定，颇费一番斟酌，而后敢于发言。即学校采用之时，亦几经请北京名人之审定，而后乃毅然采定。采定后，复请何林一夫人精心制曲，始琅然可歌。

这个叙述比较简单、概括。在其他有关史料中也未见更详细的记载。最近仔细

查看了《清华周刊》，找到了下列的记载。

在《清华周刊》227 期（1921 年 11 月 25 日）见到了当年征求新校歌的启事，现照录如下：

兹接校长处送来启事一则，特为披露于下：

征求国文校歌

查本校校歌只有英文，而无国文，现在征求国文校歌。校中教职员暨学生，不乏精于诗歌之士，或就原有英文校歌，译为国文校歌，或用国文，另作校歌，均所欢迎，如有佳稿请交校长处，以便择优采用为荷。

直到 1924 年《清华周刊》上才再次有了关于中文校歌的记载。在《清华周刊》第 307 期中，在刊登的歌谱下方有“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十二点半第一次全体练习，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三点一刻第一次正式合唱”的准确时间记载。

这一期中还有：

要闻：（一）上星期四（三月二十日）举行全体大会，会序除唱国歌校歌外，由曹校长致演说词。……（三）新中文校歌已编就，暂定每星期一、三、五午饭后在大礼堂练习。

还有：

专记：全体大会略记（稚）

□ 史料一页

本校全体教职员学生，于三月二十日集会大礼堂，唱新编校歌及听校长训词也，鸣钟三响，全堂肃然，乃唱校歌，乃听训词。……校长词毕，继之者为唱国歌，四时半散会。

这条专记验证了1924年3月20日中文校歌第一次正式合唱的记载。

在其后的几期《清华周刊》中都有关于唱中文校歌的记载。例如《清华周刊》312期（1924年5月2日）：

专记：十三周年庆祝大会

本校十三周年庆祝大会，已于本月二十六日在校举行预祝。下午二时即齐集大礼堂内。……最后全体起立，合唱新编校歌，练习既久，更显娴熟，清华精神，尽注此歌中矣！

《清华周刊》314期（1924年5月16日）：

专记：五月九日国耻纪念大会（任）

……下午三点十分开会，主席宣布起立，唱“西山苍苍”校歌。

由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到，中文校歌诞生后非常受师生的欢迎，在重要的集会上都要唱，有时是中英文校歌并唱。

在汪鸾翔先生的遗墨中有一部《炳烛斋日记》，日记起于1921年7月18日，止于1926年年底。日记中或繁或简地记录了汪先生在清华学校期间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提供了大量有关清华学校教学和教职员活动信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汪鸾翔先生的《炳烛斋日记》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编写校歌的记载。在1924年的《炳烛斋日记》中倒是有如下一些记载：

3月18日，星期二：早乘人力车至校，上三课：国四乙——讲校歌；哲史三——

王介甫与戴东原；伦理甲——同国四乙。

3月20日：上二课：国四乙；哲史三——蜀学略。三钟后全体大会，曹校长演讲。

3月21日：上一课：伦理乙——讲校歌。

上述记录中，国四乙是指高四级乙班国文课，哲史三是指课程哲学史三。国四乙后面的“讲校歌”是指该堂课程的教授内容。18日和21日的“讲校歌”与《清华周刊》中记录的第一次全体练习与第一次正式合唱的时间正相吻合。20日的全体大会也与《清华周刊》内的记录相合。这里的讲校歌，肯定就是讲解汪先生自己作词的新中文校歌了。

除了上述有关清华校歌的记载和汪先生编写的《真义》一文外，当年还有两篇有关校歌的评论。这两篇文章的重点摘录如下。

在首次发表清华中文校歌的《清华周刊》第307期上，第一页就是《社论：新校歌之教训（果）》。作者应为李惟果（当时为高一级学生、《清华周刊》编辑）。文中说：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新歌悠扬。吾闻之而志舒，吾闻之而心怡，吾闻之而不得不深怪昔之主事者之谬置也。吾尝至教会学校矣；生徒之谈也英文，书也英文，歌也英文。吾又尝莅国立学校矣，生徒之谈，中文也；书，中文也；歌，中文也。夫国立教会学校之分，宁非以一受洋化，一则堪自保其国粹耶？清华于此二者奚择焉？然而清华之谈也如何？书也如何？书谈微不论。若近十年而无中文校歌，事之尤乖谬者，吾闻之而心痛，而心悲，而心耻。耻中国学校而无中国校歌也；耻清华之善忘其国华，而必服膺他人之糟粕也；耻当

局学生见义勇为而不能勇为也。

该作者是从爱国和国家尊严角度出发，以中国学校而无中文校歌而心痛、心悲、心耻。而对新的中文校歌则“闻之而志舒、闻之而心怡”，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篇文章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58期上，即贺麟（当时为高四级学生、《清华周刊》总编辑）的《〈清华中文校歌之真意义〉书后》（以下简称《书后》）。摘录如下：

校歌之性质属于教训诗。（Didactic Poetry）此类的诗歌，不但是要形式美，而且含义须深。故校歌至少要能表出一校之精神，之校训，夫与教育宗旨，能进一步于校歌中表出一国之国民性，与文化精神更好。

我把英文校歌，念了又念，总看不出它的真意义在那里。此歌与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校训，一点关系没有；于清华荟萃中西文化，造就领袖人才的宗旨，也风马牛不相及。歌中很多难听的句子，与中国的国民性，更是格格不入。

我常说清华现在的中文校歌（形式和音乐方面的美的价值如何姑且不论），实儒家学说之结晶，可以表示中国文化之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表达出清华教育宗旨。且校歌措辞，亦颇得体。故自次校歌公布后，虽无人撰文正式批评，而大家均觉欣赏此歌。无惑乎学校开全体大会时，总是唱中文校歌，无形中中文校歌，已取英文校歌之地位而代之了。作者主张：

一、自清华正式宣布大学及研究院成立之日起，便正式宣布取消现行之英文校歌。

二、如大家认为中国人所办之清华学校，有用英文校歌之必要时，可请赵元任、

吴雨僧、张歆海先生等另撰一英文校歌。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贺麟首先对校歌的内涵提出要求，继而对英文校歌作了不良评价。而对新的中文校歌则作了高度的肯定。

在当时，对于汪鸾翔作词的中文校歌也有不同的意见，《清华周刊》339期（1925年3月13日）内有下列的记载：

协进委员会：委员会作下列之建议：……（丙）增加校歌与校呼。我校中文校歌，缺乏勇敢尚武之精神，校呼亦太少。现斋务处与德育指导部正拟定条告征求校歌校呼作品，望职教员同学踊跃投稿。……协进委员会仅有建议之责，并无执行之权。右列诸事之能否实行，当视校长斋务主任与德育指导部主任之意见而定。

《真义》中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本校歌不偏重尚武之原因”。看了这条记载，我们才能理解汪先生论述这个题目的实际原因。

1928年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曾打算更换清华校歌。在他的1930年1月5日（星期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早即为清华拟校歌，原有校歌太不成，（一）无理想；（二）且无意义；（三）即文字亦多不通。另拟校歌一事，蓄意已久，酝酿胸中，至今方下笔。分两段，上段重学，下段重行。学的方面，注重造成敦朴实在之学风，并冀培养出精深学术的研究；行的方面，在祛偏狭、苟安、自利之浇风，而以为而不有、成而不享为最高原则。词句几经斟酌，并示金甫。

“金甫”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杨振声。

吴宓先生在1930年1月6日（星期一）

□ 史料一页

的日记中也有一条记载：

晨十时，罗校长招宓至办公室，以所作《校歌》相示。

在有关1930年5月4日国立清华大学庆祝19周年校庆游艺晚会的报道中有：

主席报告本校更易校歌事，谓原有校歌不能谓不佳，但文字间似有可推敲余地。因此不自揣谫陋，制一新歌，经杨振声和吴宓先生修正，赵元任先生谱之音乐。并请练习者登台一唱，得掌声一片。

文中的主席就是罗家伦校长。

在《赵元任年谱》中有下列的记载：

1930年5月2-4日，谱清华大学校歌（四部合唱）。

从上面的几条记录看，1930年罗家伦确实编写了新校歌，并已谱曲。但不久罗家伦就辞职了，更换校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9年后，汪鸾翔先生作词的校歌不再提起，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首歌逐渐在校友活动以及学校重大活动中传唱，并为广大师生校友所喜爱，也成为清华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象征，虽然在正式文字记载中都称《清华大学老校歌》，但实际上它已经是清华人心目中的校歌。2014年教育部批准了新的《清华大学章程》，其中第六章中规定了校歌为《清华学校校歌》。汪鸾翔先生作词的这首歌作为清华大学正式校歌又一次载入史册。

二、清华校歌的主旨分析

汪鸾翔先生编写的中文校歌有三段歌词，现按照1924年发表的原歌词录入如下：

第一段：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

然中央。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爱跻，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第二段：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新旧合治，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

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第三段：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孰绍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

万仞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词作者本人对校歌的主旨，在《真义》中是这样说的：“本校歌所含之元素。本校歌不偏重于尚武，既如前所述矣。然则所持以馈赠清华学子者，果何物耶？”

歌词中的“大同爱跻，祖国以光”，以及“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就是校歌的最重要的主旨。《真义》中说：“诸君日处此暖炉电灯之旁，亦尚忆中原有无数饥寒欲死之困苦同胞否乎？诸君日游此书林艺苑之间，亦尚忆中国有无数毒

如蛇蝎之军阀政客否乎？再远望之，彼沉沦于物质之迷梦，而日吸吾人精血以去者，更一望无涯。种种惨状，一出清华园门之外，即可见之。以佛家慧眼观之，真可谓地狱、饿鬼、畜生、诸恶趣也。吾人幸尚不堕入此等恶趣之中，宜如何发奋救人？”从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词作者以急切的忧国忧民的心情，要把救国救民、强国富民、振兴中华、实现传统的中国梦想（大同世界）作为本校的最大责任与目的。“行健不息，须自强”是把校训融入了校歌内。

“中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治，殊途同归”是校歌的另一主旨。《真义》中说：“救人之法，万别千差。今在校言校，且先从力所能及者做起，略为整顿学术焉可矣。与本校最适宜，且今世最亟需之学术，尤莫亟于融合东西之文化。故本校歌即以融合东西文化为所含之‘元素’。”词作者在校歌中表达了救国救民的途径，在学校就要“教育救国”，尤其是针对清华学校的特点，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在《真义》中，汪先生对“中西融合”有很深刻的论述：“盖一国之有文化，犹一人之有技能。人无技能，不能生存于社会；国无文化，不能存在于地球。大略言之，凡国家之富且强者，必有其固有之文化，或外来之文化，贫且弱者反是。我国闭关之时，只用固有文化，已足自治；海通以后，外来文化，有胜我者，亦不能不并蓄兼采共炉而冶之。故仅守固有文化，而拒绝外来文化者固非；而崇拜外来文化，以毁灭固有文化者，更无有是处也。本校之最大责任与目的，即是为本国及世界作此一件大事。而本校歌之‘元素’，亦即为此大事，略示雏形。然则是歌含有深微之意，非寻

常粗浅之歌所能比也。”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也是校歌的主旨之一。在《真义》中没有对这两句加以特别说明。而在汪先生的其他论述中，常可以看到“先学做人，再学做学”的句子。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在学校中要首先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服膺守善”“学问笃实”“海能卑下”等，歌词中处处激励学子们奋发向上，自豪而又谦卑、笃实，忠心而又大度，种种优良品德，教之谆谆。

以上的种种元素，在今天也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以这首校歌在今天仍然被采用是很有道理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徐葆耕对校歌的“现代性”曾经做过很好的阐发。

三、清华校歌的写作背景和作者

在当年能够产生这样一首校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首先是社会环境。当年是社会动荡，国难当头，民生艰难。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腐败软弱，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激发了国人奋起救国的思想和行动，维新变法失败，辛亥革命继之而起。而在革命后仍有北洋军阀的混战，内战不止，外患不断。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其在5月9日签订了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以后一些年5月9日就是国耻纪念日，学生们都要开纪念会、游行示威。1919年五四运动更是掀起了一场长期的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爱国、救国成了每个师生的中心思想。

清华学校又有其特殊性，学校是在庚

□ 史料一页

子赔款基础上建立的，学校大权掌握在美国人为首的董事会手中，毕业生都留学美国，所以校风受美国的影响很重，比较重视英文教学。但在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励下，也激起了清华学生的反思。为了在留学回国后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也开始更重视国学的学习，中西贯通的思想成了师生的共识。为了国家的尊严，对中文校歌也有了更迫切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校歌的主旨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得以完成这样一首校歌，与词作者的人生经历也是很有关系的。

词作者汪鸾翔先生，字巩庵，又字公严，187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书香门第。祖母和母亲都善于诗词，遗有诗集。先生五岁时就由祖母和母亲授以唐诗三百首和毛诗。15岁时参加童子试，录为县学生（秀才），其后先生的父亲不鼓励他学做八股文章走仕途之路，而是带着他赴广东游学。汪先生在其晚期写的自传中说：“遇欧阳霭臣先生，课以朱程之学，余始知人生尚有圣贤之学。”188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学院，先生以广西第一名录取进入学院学习，深得张之洞和学院院长梁鼎芬的赏识。1891年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名列广西第四名。1892年进京赶考未中，留在国子监南学学习。汪先生的回忆中说：“此时科举之制已成强弩之末，而西学渐兴。甲午中东战后，朝士更知非维新无以救国。余于是凡有新译书出，必购一本读，久之逐渐能通其说。时人遂称之为新学家。”这时汪先生既有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也自学掌握了多门西方科学的知识。

张之洞在武昌，大举兴办实业和新学堂，1897年秋欲编写《劝学篇》，遂电召

汪鸾翔先生到武昌。汪先生晚年自己回忆道：“奉两湖总督电召赴鄂，张文襄师留居署中，与海门周彦昇家禄同采摘古人言论之有益时政者，供作《劝学篇》用。历三月始毕事。复由公闭门谢客，七日自纂成篇。其书以正人心开风气二语为宗旨。分上下两编，采取新学而不废旧学，持论和平，颇为布帛菽粟之言。”《劝学篇》充分地反映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汪鸾翔先生是深受其影响的。这些思想在清华校歌中都有所体现。

早年汪先生就在广州聆听过康有为的维新宣传，1898年春又在北京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召开的宣传维新的会议，并参加了鼓吹维新变法的组织——保国会，积极参加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先生目睹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也目睹了刑场上观众的麻木不仁。先生痛心地感到救国要从教育国民开始。先生回忆说：“入鄂后即以开通民智为己任。以博物、理化、数学、地理诸学引导新进大小诸校，无有不经余讲授者。”汪先生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工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多所学校教授西方科学课程，前后共十年。当时能教授科学课程的国人还很少，汪先生是先驱者之一。从现在留存资料看，汪先生当时还编写过一本《动物学讲义》，可能还编写过物理和化学课程的书。汪先生回忆说：“初时鄂中缺少是等学术，远聘日人，其骄傲不可一世。后见此等学术中国人亦有能为之者，其气为之稍敛。始知兵战不如学战，此言固不虚也。”

1911辛亥革命后，汪先生鉴于归国留学人员渐多，科学教学人才济济，而国学反倒受到忽视，于是又改为教授国文。先

后在天津、保定各大学教授国文等课程。1917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任教。1918年暑假后到清华学校任课，直至1928年离校退休。

就在汪先生创作中文校歌期间，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汪先生的《炳烛斋日记》中记录下了北京城内听到彻夜的炮声，清华学校围墙外，流窜着大量的散兵游勇，社会治安极坏。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作者的心情可想而知。在“真义”中汪先生写道：“吾言至此，吾泪涔涔，吾心怦怦，吾之秃管亦振荡而不宁。诸君！诸君！诸君！”连呼了三次“诸君”以提醒大家，这是以多么激动的心情说出了下面的话：“种种惨状，一出清华园门

之外，即可见之。吾人幸尚不堕入此等恶趣之中，宜如何发奋救人？”如何发奋救人、救国正是汪先生编写校歌的出发点。

《真义》中写道：“司徒雷登先生（注：当年为燕京大学校长）之言曰‘将来必有两新大国，产生于太平洋之两岸。两大国者，美与中也。’吾谓此两新国实现之后，人类精神，必将一变，即吾前之所言诸恶趣，亦自销灭。”在当年那么恶劣的国内外环境下，汪先生对国家的兴盛仍然抱有强烈的期望和满满的信心，难怪清华校歌中充满了光明、乐观、催人向上的积极情绪。

（汪端伟，汪鸾翔先生长孙，现正在对汪鸾翔先生留存的大量遗稿进行整理。）

西南联大校舍沧桑

○陈岱孙（1920）

西南联大的前身是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是1937年抗战爆发平津失守后，由当时参加庐山会议未及北返、滞留南京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南京教育部商定组建，并以长沙为校址的一所战时联合的大学。

但到了1937年年底，沪战失利，南京沦陷，长江中游告急，长沙震动，临大在长沙上了一学期课之后，经教育部批准，又于1938年迁到昆明。是年元月，北大校长蒋梦麟率领几位同仁先到昆明，负责组建工作，旋即奉命改长沙临时大学为西南

联合大学的新校的先遣工作。先遣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急于寻找、租借可供利用的临时校舍。昆明本为后方名城，但绝不可能再有一套可供联大两千多师生驻足的如长沙圣经学校那样的现成校舍。在云南省政府的大力协助下，西南联大先租下了昆明东南城外迤西、江西、全蜀三个会馆为立足地；继向昆明西北城内外的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业学校、昆华农业学校、昆华中学等由于战事关系开始初步疏散下乡的一些学校，分别借些教室、宿舍，期于凑成一个分散但够用的校舍。但这东拼西凑的借贷的房室，仍然不足以满足来昆的